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
—從幾張老照片談起

謝明良*

【摘要】本文主要是考察臺南熱蘭遮城等遺址所見泰國和越南陶瓷。經由國外陸地考古遺址出土標本或沈船打撈資料，以及學界對於東南亞窯址的調查成果，可以確認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四繫罐標本包括有十七世紀泰國中部Singburi窯系製品。至於遺址出土的越南高瓶殘片則應是來自越南中部一帶窯場所燒製。另外，一幅拍攝於1920-30年代的排灣族頭目照片中所見施釉罐亦屬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的泰國陶瓷。結合文獻記載，本文認為，澎湖風櫃尾採集或臺南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四繫罐極有可能是由荷蘭人所攜來，不過流傳於臺灣民間的十七世紀同式罐，則除了荷蘭人之外，也有可能是由鄭氏集團或日本朱印船海商之手帶入的。另一方面，本文還確認了以往所公佈的澎湖採集或臺灣海峽打撈上岸的陶瓷當中也包括有越南和泰國陶瓷。其年代有的可早自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此為探討此時日本和東南亞貿易交往時的行經路線，提供有趣的線索。

關鍵詞：十七世紀　福爾摩沙　熱蘭遮城　泰國Singburi窯　泰國Sisatchanalai窯　越南青瓷

如果從考古學嚴密定義下的「遺物」角度來審視本文的議題，那麼做為本文討論對象的「物」，有的未免不倫不類。這也就是說，對於講究遺物和遺址之間關係，探索遺物在遺址存在脈絡的考古家而言，脫離遺址的遺物往往已非可以嚴肅討論的對象，更何況實物已難追索的照片中的圖像呢？雖然，運用石刻、畫軸、壁畫等不同材質的圖像資料來探索、復原畫面所見器物的存在情況，是包括陶瓷史在內許多學科研究者所經常採行的手法之一，然而這些圖像資料若非亦屬古物，至少也是古物的印拓或摹模，這也和本文部份內容以近代照片中的圖像做為探討的對象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我很清楚本文以下的論述，有的只是立足於近代民間學者田野調查時所拍攝的影像資料，故其可靠性或許見仁見智，然而與其坐等今後未可預期的考古發掘成果，或可將之視為另類珍貴線索給予必要的關注。幾張舊照所見泰國古陶瓷的器形種類，包括了泰國中部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ngburi地區所燒製的無頸和帶頸四繫罐，以及Sawankaloke市Sisatchanalai窯群的鐵繪小罐，分別介紹如下。

一、泰國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

1970年代劉文三著《臺灣早期民藝》一書，主要是收錄劉氏走訪臺灣民間古厝時所拍攝或收購的手工藝品。其中包括一件廣口四繫罐，罐口沿呈唇口，無頸，口以下近肩處飾數道陰刻弦紋，弦紋上方罐肩部位以粗泥條對稱置四只半環形繫耳，最大徑約在器正中，以下弧度內收成平底（圖1）。①雖然照片無法清楚顯示作品尺寸或施釉與否，但從其造型和裝飾特徵，可以判斷是來自泰國中部Singburi縣Bang Rachang郡Ayutthaya（大城）北西Mae Nam Noi，即Noi河窯系所生產，②該窯系之2號窯曾經泰國藝術考古部進行發掘，其中報告書所分類的第二型壺（圖2），③其造型就和上引劉氏攝自臺灣古厝的四繫罐大體一致。有關Singburi地區所生產的這類無頸四繫罐的年代，學界主要是參照a.沉船，b.陸地考古遺址所出同類標本來訂正的。

a.沉船打撈品

發現有泰國Singburi窯系此類四繫罐的沉船分佈較廣，至少見於東南亞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東北亞日本海域。另外，澳洲或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以及非洲西部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等沉船遺留亦可見到同類標本（表一參見）。其中，菲律賓八打雁（Batangas）幸運島海域打撈上岸的西班牙籍旗艦San Diego（聖迭戈號），是於1600年12月14日遭受荷蘭艦的砲擊而沉沒；非洲幾內亞灣南部佩洛斯角（Cape Lopez）發現的荷蘭東印度公司*Mauritius*（毛里西斯號），則是1607年自萬丹（Bantam）滿載商貨於返航中失聯，直到1609

①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頁57圖7。

② Roxanna M. Brown於1970年代已經指出一件類似的四繫罐是十七世紀Singburi窯系所燒造。見同氏，*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 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 1988), pl. XLIII. b.

③ Caaruk Wiraikeow，〈タイ國シンブリー縣ノイ窯跡群發掘調查報告書〉，《關西近世考古學研究》X（2002），頁2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倖存者返回阿姆斯特丹後，才得知該船於1609年3月19日觸礁沉沒。其次於1613年赴大西洋聖海倫那島補給物資的荷蘭東印度公司*Witte Leeuw*（白獅號），因遭逢葡萄牙船，雙方交戰結果，*Witte Leeuw*終於在1613年11月1日被擊沉。另外，同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的*Vergulde Draeck*（費尼得・德雷克）（圖3）則是自荷蘭駛往印尼巴達維亞的途中於西澳海域觸礁沉沒，時在1656年4月28日。以上四艘帶有明確紀年的十七世紀初期沉船都發現了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

另一方面，雖乏明確紀年資料，但從伴出遺物可大體判明其相對年代的數艘沉船亦見同類四繫罐。其中泰國*ko kradat wreck*（kradat島號沈船）因伴出「大明年造」、「永保長春」等常見於明代嘉靖（1522—1566）、萬曆（1573—1619）時期的青花瓷，估計其相對年代約在十六世紀中期或偏後；*Ko Si Chang I*（Si Chang島一號船）（圖4）則因伴出萬曆款青花瓷，故其年代應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此外，馬來西亞*Singtai*和因伴出「宣德」銘款青花瓷而得名的*Xuande*（宣德號）等兩艘沉船，學者們也早已經由打撈上岸的中國陶瓷推定均屬十六世紀中期沉船。至於日本九州山見沖海底遺跡，則因伴出推定屬明代萬曆年間的青花瓷，所以其相對年代也應在這一時期。

綜合以上沉船資料，可以認為泰國Singburi窯系四繫罐可能是做為某種貿易商品的外容器而隨著各國船舶出沒各地，其年代可早自十六世紀，但集中見於十七世紀前期。不過，個別十八世紀沉船亦見同類無頸四繫罐，如馬來西亞柔佛州發現的沉沒於1727年之荷蘭東印度公司*Risdam*（理斯頓號），即見同類標本。過去，向井亙曾經指出：比起十七世紀前半作品，*Risdam*沉船所見四繫罐頸和肩的交界愈趨模糊，器身亦漸趨圓。④就目前的資料看來，Singburi地區有複數窯場都曾燒製此類四繫罐，而經發掘的Bang Rachan2號窯也是並存幾種不同形式的四繫罐，⑤菲律賓*San Diego*沉船亦伴出兩式造型不盡相同的這類四繫罐，故其詳細的分類和編年仍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雖然如此，僅從作品外觀的粗淺比對而言，劉氏所揭示遺留在臺灣的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的造型特徵，要和1613年荷籍*Witte Leeuw*（白獅號）沉船作品最接近（圖5），故其相對年代可能也在十七世紀初期。

④ 向井亙，〈タイ黒褐釉四耳壺の分類と年代〉，《貿易陶磁研究》23（2003），頁102。
⑤ Caaruk Wiraikeow，同註3，頁220第2型和頁201第3型。

臺灣大學臺北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陸地考古遺址

經正式發表的出土有泰國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的遺址（表二參見），明顯集中於日本列島，此一出土分布除了表明日本的考古發掘工作進行得較為細緻，似乎也反映了日方已儲備不少足以辨識此類陶瓷產地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不過，若參酌沉船發現例看來，這樣的出土分布情況恐怕也和我個人的資料取得途徑極為有限，並未取得日本以外地區的考古發掘報告書一事有關。無論如何，歷年來日方學者針對Singburi窯系四繫罐的基礎研究，提供本文極大的助益。以博多地區而言，由森本朝子所彙整的五例當中，有四處遺址的相對年代在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之間；其中四例（表二，no. 1-4）造型與1600年*San Diego*沉船所出作品相似。⑥其次，扇浦正義和川口洋平二人也梳理了長崎縣內二十一個出土案例，⑦其遺址性質包括1641年荷蘭人在出島這一人工島上所設置的商館、荷蘭長官公署等十七世紀遺址，以及金屋町、萬才町、五島町、櫻町、榮町等遺址，其中除了萬才町中一例是出土於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遺址，其他均集中見於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初期遺址（表二，no. 6-28參見）。

另外，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出土同類標本則有森村健一和續伸一郎二人的研究，前者結合沉船遺物針對作品的年代和產地進行了考察，⑧後者則予以型式編年（圖6），而其所分類的IV式之外觀特徵則和前揭臺灣古厝傳世的四繫罐造型最為接近，該式除有一例是出土於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初期遺址，其餘大都見於慶長二十年（1615）燒土層中（表二，no. 2-43參見）。⑨應予一提的是，有關泰國Singburi窯系四繫罐的分類和編年，以近年向井互的論稿最具參考價值，我將做為本文主要論旨的劉氏前揭四繫罐稱為「無頸四繫

⑥ 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について〉，《シンポジウム陶磁器が語る交流—九州、沖縄出土の東南アジア産陶磁器—》（鹿兒島：東南考古學會等，2004），頁10附表參照。

⑦ 扇浦正義、川口洋平，〈長崎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シンポジウム陶磁器が語る交流—九州、沖縄出土の東南アジア産陶磁器—》（鹿兒島：東南アジア考古學會等，2004），頁27附表參見。

⑧ 森村健一，〈16—17世紀初頭の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四耳壺—タイでの窯跡、沉沒船の出土例—〉，《貿易陶磁研究》9（1989），頁134-151。

⑨ 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製四耳壺〉，《貿易陶磁研究》9（1999），頁125圖2之5、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罐」即是參考了向井的器形分類方案。雖然向井氏對於沉船出土作品的掌握仍有所遺漏，不過泰國Singburi窯系之無頸四繫罐罐式確如同氏所指出，約出現於十六世紀中期，除了馬來西亞海域*Singtai*和*Xuande*兩艘沉船之外（表一，no. 5，6參照），日本大分市大友城下町因1568年島津入侵而發生的火災遺留（SX210）或愛媛縣松山市湯築城址推定屬十六世紀中期之第三階段區劃7等遺址都出土了同類四繫罐標本，至於十七世紀標本則見於堺市數處考古遺址（表二參見）。⑩

綜觀以上沉船和陸地考古遺址並結合窯址調查資料，可知該類無頸四繫罐的尺寸大小不一，也因此向井互將之區分為大型（約60公分）、中型（約45公分）、小型（約25公分），小型者是以轆轤拉坯成形，大、中兩型則是分別做出上下二段後，再予以接合。⑪這類罐器壁一般較厚，可區分為無釉素燒和施釉等兩類製品，後者施釉罐釉色呈色不一，有的呈暗褐或橄欖綠色，也有施加褐中偏綠或偏灰白的狀似化妝土的失透釉。從已發掘的Bang Rachang 2號窯資料看來，兩類製品並存於同一窯爐當中。⑫

儘管Singburi窯系這類無頸四繫罐的尺寸、釉色和胎質不盡相同，但均於肩上部陰刻數周弦紋，弦紋上方對稱加置四只繫耳。繫耳是隨意地將略呈馬蹄狀半環形的粗泥條捺押黏附於罐肩，故繫耳兩端留下明顯的以手捺押或不經心的整修痕跡，極具特色。值得留意的是，中央研究院劉益昌教授在調查澎湖風櫃尾遺址所採集標本當中，即包括數件泰國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的口肩部位殘片，其器表施罩褐中偏橄欖綠色調的失透薄釉，露胎處胎略呈磚紅色（表二，no. 50，圖7）。

眾所周知，1622年荷蘭艦隊司令雷約茲（Cornelis Reijerszn）率艦隊入澎湖媽公澳（今馬公港），同年派遣船隻航向大員（今臺灣安平地區），並開始在位於澎湖西南端的風櫃尾蛇頭山上構築城堡。⑬1624年荷蘭在中國武力的壓力下同意著名海商李旦的斡旋撤離澎湖，交換條件是中國允許荷蘭人赴當時迄未納

---

⑩ 向井互，同註4，頁90-105。

⑪ 向井互，同註4，頁95-96。

⑫ Caaruk Wiraikeow，同註3；森村健一，同註8，頁140。

⑬ 林偉盛，〈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6（1999），頁1-45，以及曹永和，〈澎湖紅毛城與天啟明城〉，收入同氏，《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頁149-183。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入中國版圖的臺灣貿易，故荷蘭人於同年八月自毀風櫃尾城寨轉赴大員北端的高地建築城堡，初稱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年奉總公司命令改稱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因此，風櫃尾遺址所採集之Singburi窯系四繫罐標本的相對年代有可能在十七世紀二〇年代前後不久。如果說，本文依恃當代民間學者的攝影圖像試圖說明臺灣古厝流傳有十七世紀的泰國古陶瓷一事未免一廂情願，那麼上引劉益昌在澎湖島採集到的標本，無疑為此推測增添了有力的註腳。不僅如此，令人振奮的是，2003年劉益昌考古團隊接受臺南市政府委託正式發掘熱蘭遮城遺址時，也出土了同類Singburi窯系四繫罐標本（表二，no. 51）。⑭此類標本計有二件。其中一件為繫耳殘件，表施褐釉，出土於第5號探坑（TP5-IV.9 L4f）。另一件亦屬罐肩部繫耳部位殘件，後者係出土於遺址第3號探坑的最底層（TP3 A-I2, L4a），與所謂的安平壺殘片共伴出土，素燒無釉，淺磚紅色胎中夾雜有砂石狀雜質（圖8）。有趣的是，同類磚紅色胎無釉素燒四繫罐，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十七世紀居住遺址亦曾出土（圖9），據說是做為收貯壁爐灰燼的容器（表二，no. 52）。⑮這樣看來，考古發掘既證實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泰國中部Singburi窯系無頸的繫罐，而若結合國外沉船或陸地遺址所見同類標本，同時參酌熱蘭遮城築城史事以及出土遺址層位和共伴瓷片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Singburi窯系標本之年代應在十七世紀，而前引劉文三拍攝自臺灣古厝的同類罐，也極有可能是十七世紀攜入臺灣後流傳至現代的傳世品。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1609年*Mauritius*、1613年*Witte Leeuw*、1656年*Vergulde Draeck*等沉船（表一，no. 8-10），以及1622年由荷人構築的風櫃尾城城址均見Singburi窯系四繫罐，因此又可推測1624年破土開基，⑯大體竣工於1632年的臺南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土同類標本，很有可能是由荷蘭人

⑭ 傅朝卿、劉益昌、李德河，《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臺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基金會，2003）。筆者受邀為該計畫的協同研究，參與陶瓷標本的鑑識。標本現暫存中央研究院考古學專題研究中心。在此要感謝計畫主持人劉益昌教授在標本尚未整理完畢的階段，就慨允我先行發表這一資料。

⑮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ク―》（東京：東京都歷史文化財團，1996），頁118圖1-92。不過，該文作者阿姆斯特丹市考古局Jan M. Baart是將這件四繫罐判定為中國十七世紀製品。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所攜來的。

二、泰國Singburi窯系短頸四繫罐

1980年代初期日本東京都涉谷區舉辦了名為《臺灣高砂族の服飾》特展，展出了涉谷區民瀨川孝吉滯臺期間所蒐集得到的原住民文物，配合瀨川氏多幅攝影照，生動地傳達出臺灣原住民的衣冠配飾情況。圖錄當中，有一幀由瀨川所拍攝的排灣族頭目盛裝照，頭目身旁女子前方置一高度及膝的施釉大口四繫罐（圖10）。⑰依據湯淺浩史所撰〈瀨川孝吉先生略傳〉，則瀨川孝吉（1906—1998）早在1928年就讀東京農業大學期間已曾來臺灣採集植物標本，1931年自同校畢業後隨即任職臺灣總督府理蕃課，曾參與制定臺灣原住民的教育、醫療或生活指導等工作，及至1939年轉任拓務省離開臺灣的十一年間，其以重達1.5公斤玻璃版Alpin和當時新發明的膠卷Leica相機所拍攝的臺灣原住民影像，估計超過一萬張。⑱上揭舊照即為其中的一張，拍攝時間應該是在1928—1939年之間，所以我認為可以做為理解當時排灣族物質文明的人類學田野調查記錄。瀨川本人顯然也對這件和排灣族低溫素燒陶器迥然不同的高溫色釉四繫罐頗為好奇，以致於還另外拍了一張以這件四繫罐搭配頭目寶劍的特寫近照（圖11）。⑲可惜四繫罐目前下落不明。

照片上的四繫罐口沿向外翻卷，口以下置上斂下豐的喇叭式短頸，斜弧肩，最大徑在器肩，肩以下弧度內收。頸肩交界處對稱置四只半環形橫繫，器肩另飾陰刻弦紋數周。器外整體施釉，但器身腹部分施釉不勻，有明顯流釉痕跡。

---

⑯ 村上直次郎（韓石麟譯），〈熱蘭遮城築城史話〉，《臺南文化》3-3（1953），頁11-13；3-4（1954），頁45-48。

⑰ 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臺灣高砂族の服飾—瀨川コレクシヨン—》（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3），頁74左上圖。

⑱ 湯淺浩史，《瀨川孝吉 臺灣原住民影像誌—鄒族篇》（臺北：南天書局，2000），頁xx-xxi。

⑲ 鈴木秀夫，《臺灣蕃界展望》（臺北：理蕃之友發行所，1935），頁83圖下「大股頭人家所藏の寶劍と壺—高雄州內文社—」。內文社（Chakobokoji社），屬「恆春上蕃」（Chaoboobol）之一，位於枋山溪中游北邊，即今屏東縣獅子鄉境。我是因王淑津（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的教示，才獲知此一圖照的存在，王淑津同學並告訴我此一珍貴資料是承蒙南天書局魏德文先生所提供。在此謹向二人表示謝意。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從作品與照片中人像的高度比例推測，罐通高約在50公分左右。依據上述器形外觀特徵，可以得知其應是來自泰國瓷窯所生產，並且可能和前述臺灣古厝傳世或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四繫罐同屬Singburi縣Noi河窯系製品。當今學界對於此一類型四繫罐的年代訂定，主要也是基於沉船和陸地考古遺址出土標本，以下分別敘述之。

a.沉船打撈品

發現有此一類型泰國黑褐釉四繫罐的沉船，分布於泰國、菲律賓和越南海域（表三參見）。泰國海域沉船包括相對年代於十五世紀末的*Ko Si Chang III*和十六世紀前半的*Klang Aow II* ；菲律賓海域沉船則包括年代約於十五世紀中期的*Pandanan Wreck*以及前述伴出有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的*San Diego*號（圖12）。另外，越南中部會安（Hoi An）發現的十五世紀後半至十六世紀前半的所謂*Hoi An*沉船也可見到類似標本（表三，no. 1-6）。上述沉船發現例當中，以1600年*San Diego*號四繫罐和瀨川攝自排灣族的作品的造型最為近似，兩者亦均在器肩部位飾數道陰刻弦紋。

b.陸地考古遺址

陸地考古遺址主要集中於日本（表四參見，圖13）。其中又以當時的琉球王國，伴出有大型元代青花蓋盒等珍貴文物的沖繩首里京之內遺址出土作品最為人們所熟知。京之內遺跡（SK01）推測是毀於1459年火災的王朝庫房遺留，所出七十餘件泰國陶瓷當中至少包括三十餘件四繫罐（圖14）。相對於報告書執筆者金城龜信同意並援引尾崎直人的看法，認為所見泰國四繫罐多來自該國中北部蘇可泰（Sukhothai）北方Satchanalai古城北邊Yom河（Mae Nam Yom）沿岸一帶的所謂Si Satchanalai窯系製品，⑳森村健一則極力主張京之內遺址四繫罐應是來自Noi河窯系，㉑我個人則是同意近年向井互的分類，認為京之內遺址出土的四繫罐，既包括Si Satchanalai窯系製品，亦見Mae Nam Noi窯系作品。

⑳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首里城跡—京の內跡發掘調查報告書（I）》沖繩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132集（沖繩：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8），頁216。

㉑ 森村健一，〈15世紀代のタイ・ノイ川窯系四耳壺について—琉球國・首里城「京の內」（1459年大火層一括）を中心として—〉，《南島考古》21（2002），頁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㉒見於臺灣排灣族頭目家的四繫罐則和京之內遺址所出Mae Nam Noi系作品較為接近（表四，no. 1，向井Noi系短頸Ⅰ類），但後者肩部相對圓聳，肩以下內收弧線亦較緩；1980年代泰國藝術局考古部在Singburi縣Noi河西岸發掘的二號窯址亦見類似造型的四繫罐（向井Noi窯系短頸Ⅱ類）。㉓就可大致判明相對年代的日本遺址所出Noi窯系短頸四繫罐而言，博多第124次調查所出標本約於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230地點第五次燒土層第五次生活面SB14貼床以及高知縣高岡郡姬野野土居跡所出作品，因是和十五世紀後半備前燒擂缽共伴出土，故其相對年代也約於這一時期。

綜合以上沉船和陸地考古遺址，可知泰國Noi窯系短頸四繫罐的年代集中於十五至十六世紀，最晚的實例見於1600年*San Diego*沉船。與瀨川排灣族頭目家攝影照所見四繫罐造型最為類似的作品，則是見於*San Diego*沉船打撈品（圖15），後者器形又和泰國海域十六世紀前半之*Klang Aow*沉船所出作品一脈相承（表三，no. 4），故可推測流傳於臺灣排灣族的Noi窯系四繫罐的年代約於十六世紀，至遲也不會晚於十七世紀初期。另外，應予一提的是，香港大嶼山竹篙灣也曾發現同屬Noi窯系的帶頸四繫罐殘片（表四，no. 9，圖16），出土遺址被認為是明代進出廣東和東南亞商船的中途補給站。㉔

三、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標本共計二件，均出土於2005年發掘的第7號探坑（ZLDA94, TP7-L3d, L4a），由殘片推測是屬於罐的口頸和身腹部位殘件（圖17），另從標本的胎質和印紋裝飾特徵，可以確認其應是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即《清史・暹羅傳》之「阿由提亞」，華僑所謂「大城」

㉒ 向井亙，同註4，頁90-105，以及同氏，〈タイ・ベトナム陶磁器の産地と年代〉，收入龜井明德編，《明代前半期陶瓷器の研究—首里城京の內SK01出土品—》專修大學アジア考古學研究報告書1（專修大學文學部，2002），頁70-83。

㉓ Caaruk Wiraikeow，同註3，頁199第一型。

㉔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招紹瓚等），〈香港澳門五十年來的考古收穫〉，《新中國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516-517引Weacham,“W. A Wing Trading Site at Penny’s Bay, Lantaur,”*JHKAS*, Vol. XII (1990), pp.100-115及1992年古物古蹟辦事處資料。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及其鄰近地區窯場所燒造。㉕關於其年代，我以前曾經粗略地整理過東南亞海域沈船以及日本陸地考古遺址之發現例，指出前述發現有泰國Singburi窯系四繫罐的*Ko Khram*、*Ko Si Chang I*、*III*（圖18）或*Witte Leeuw*等十五至十七世紀沈船都伴出了同類印紋陶。其次，出土有Singburi窯系四繫罐的日本考古遺址如沖繩（首里京之內）、福岡（博多）、長崎市（萬才町、榮町、興善町）等遺址也都出土了此類陶器㉖（表一～表四參見）。綜合目前所見出土有這類印紋陶器之沈船或陸地遺址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其集中於十五至十七世紀，故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標本的年代也應在這一時期。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留意到熱蘭遮城遺址所見屬於罐身腹部位殘片之印紋裝飾，和日本長崎市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宅出土同類標本幾乎完全一致（圖19），㉗也因此興善町八尾邸宅出土標本的相對年代就成了進一步判別熱蘭遮城遺址印紋陶年代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今日所謂的興善町，原稱新町（自江戶時期至昭和三十八年改名為止），是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之父末次興善於文祿元年（1592）所建設的市鎮，末次興善則是長崎開港不久即往來於博多、臺灣之間貿易並因而致富的著名資本家。發掘出土有與熱蘭遮城遺址酷似的泰國印紋陶的地點，位於江戶時代擔任新町乙名（世襲的協助處理市政的要員）八尾家的邸宅。文獻記載八尾家的先祖是出身地河內之八尾的以商販甲冑為業的源左衛門，亦即新町初代乙名，其就任日期可能在元和四年（1618）或寬永十五年

㉕ 自1970年代Spinks指出其產地是在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以來（Charles N. Spinks, "The Ayuddhaya-Period Earthenwares, Some Contemporary Thai Kilns, Their Wares and Potting Methods,"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64-2 (1976), pp. 188-189），近年泰國學者也證實了阿瑜陀耶近郊帕尼亞（Paniat）即為產地之一（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タイ陶磁について—アマラ　スリセッチャ氏に聞く〉，《法哈達》1（1992），頁49）。其次，阿瑜陀耶（大城）北郊亦曾發現燒造這類印紋陶壺的窯址（吉良文男，〈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2002），頁203）。

㉖ 謝明良，〈乾隆和他收藏的一件泰國陶瓷〉，《故宮文物月刊》21卷7期（247期，2003），頁76-87。

㉗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興善町遺跡—日本團體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8），頁74圖44。與熱蘭遮城遺址印紋陶器酷似的作品之清楚圖片，參見東京都江戶東京博物館，同註15，頁85。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1638）。㉘無論如何，連同遺址住居柱石、地下室、水井等遺構所出遺物計約三萬餘件，而從大量的燒造於1650—60年代之有田皿山外銷用陶瓷係出土於充斥瓦礫和燒土的灰坑，結合文獻記載，報告書執筆者永松實等人推測，其極可能是發生於寬文三年（1603）江戶期最嚴重的一次火災後的遺留。㉙這從遺址出土日本和中國陶瓷主要集中於十六世紀末至1660年代之前一事，亦可得到佐證。㉚如果此一判斷無誤，則興善町遺跡（八屋邸宅）出土的泰國印紋陶壺，以及與之雷同的熱蘭遮城所見標本之相對年代，也應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期。

四、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硬陶

遺址出土的越南硬陶至少有二件。其中一件（ZLDA-94,TP7-III,L4e）呈紅褐色調，無釉，器表略成鐵鏽光澤，薄胎，胎中羼白色雜質，整體以高溫燒成。器表陰刻複線弦紋，弦紋上方另飾垂幕式波形梳紋（圖20）。類似的標本於日本九州長崎市榮町、㉛勝山町、㉜金屋町、㉝爐粕町、㉞岩原目付屋等遺跡㉟或堺環濠都市遺址等都曾出土，㊱據此可知上述熱蘭遮城遺址標本應屬壺、罐或甕類之頸肩部位的殘片。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這類高溫硬陶器應來自越南窯場所

㉘ 原田博二，〈新町乙名八尾家について〉，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同註27，頁5-7。

㉙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同註27，頁1。

㉚ 大橋康二，〈出土遺物〉，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同註27，頁36。

㉛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榮町—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頁64圖43之31。

㉜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頁23圖14。

㉝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金屋町遺跡—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2），頁107圖13。

㉞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爐粕町遺跡—歷史文化博物館建設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下）—》（長崎縣教育委員會，2005），頁78圖70之943。

㉟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同上註，頁56圖48之602。

㊱ 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器〉，收入櫻井清彥等編，《近世日越交流史》（東京：柏書房，2002），頁290-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產，特別有可能是越南中部窯場的製品（圖21）。㊲另一方面，1970年代劉文三著《臺灣早期民藝》一書所收錄的一件臺灣古厝傳世的四繫罐（圖22），㊳罐口沿略呈唇口，口部下方肩部部位飾三道凸弦紋，弦紋之間陰刻波狀梳紋，並於對稱部位安四只繫耳。繫耳和凸弦紋下方另飾四道陰刻複線紋，複線紋之間裝飾有淺陰刻的波形梳紋，無疑亦來自越南所產。㊴參酌越南惠安或日本九州、堺市等可判明該類作品相對年代的考古資料看來，前述熱蘭遮城遺址或古厝傳世的越南硬陶器的年代也約在十七世紀。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另一件越南硬陶（ZLDA-94-TP7-III,1,L4c），為罐的身腹部位殘片。從殘片看來，是以轆轤拉坯成形，修整不講究，器內外留有明顯的拉痕。從斷面看來，器胎青灰當中夾有淺灰狀色層，整體呈大理石或所謂「墨流」般之層狀紋理，極具特色（圖23）。而這種以青灰、淺灰兩種不同胎土練合而成的高溫硬陶，則是越南炻器常見的特徵之一，㊵結合殘片器形，可以推測熱蘭遮城遺址標本應是越南中部一帶窯場所燒造的大口高瓶（圖24）。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越南中部廣平省首都同會（Dong Hoi），特別是蒴莊省（Sóc Trăng）窯群都燒造有這類高瓶。由於後者塑莊省（Sóc Trăng）窯址已經正式發掘，從而可知，日本等地出土的此類大口高瓶應是來自越南中部窯場所生產，窯場的存續時代約於十六世紀中後期至十七世紀前半期。㊶另一方面，就日本出土例而言，類似的大口高瓶多見於森本朝子所區分的第三期（十六世紀中葉—十七世紀中葉），出土地點則集中在以堺、大阪為中心的九州東岸和瀨戶內海沿岸，值得一提的是，平戶荷蘭商館建造之前的地層也出土了此類高瓶。㊷

㊲ 森本朝子，〈ベトナムの古窯址〉，收入《南蠻、島物—南海請來の茶陶》（東京：根津美術館，1993），頁139；菊池誠一，《ベトナム日本町の考古學》（東京：高志學院，2003），頁224圖6之6參照。

㊳ 劉文三，同註1，頁61彩圖。

㊴ 如越南中部窯群即出土有類似的四繫罐。圖參見菊池誠一，同註37，頁224圖6之6。

㊵ 菊池誠一，同註37，頁194。另參見同氏和阿部百里子合著，〈ベトナム燒締陶器の製作技法〉，收入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紀要，《ベトナム ホイアン考古學調查報告書》vol. 4（1997），頁183-191。

㊶ 菊池誠一，同註37，第四章〈中部ベトナムの陶器生產の展開と歷史的背景〉，頁211-240。

㊷ 森本朝子，〈ベトナム陶磁—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の成果と課題〉，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周年紀念《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28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前引日本金屋町或爐粕町等遺跡亦如熱蘭遮城遺址所見，均同時伴出了越南複線陰刻弦紋硬陶以及大口高瓶等兩類標本。

五、臺灣的中途轉運站位置和澎湖水道打撈上岸的Si Satchanalai窯系鐵繪小罐

自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在臺南設立據點以來，即以臺灣做為連結日本、中國或東南亞、歐洲諸國的貿易中途站；1661年鄭成功登陸臺灣，翌年驅逐荷蘭在臺勢力，同樣也是以臺灣為基地與日本和東南亞諸國進行貿易，而日本的朱印船也經常往返於臺灣與東南亞之間。因此，臺灣出土或傳世有十七世紀東南亞陶瓷一事，毋寧是極為自然的事。比如說鄭成功於1655年就親自派遣二十四艘船赴東南亞各地，其中兩艘赴東京（今越南北部），另有四艘抵廣南（今越南中部）。[43]在此之前，日本朱印船亦經常往返於臺灣和南洋進行貿易，[44]其中又以僑寓日本平戶的華人領袖李旦最為活躍。自1614年至1625年間由李旦及其胞弟華宇派往東京、交趾、呂宋等地的計二十三艘朱印船中，有十一艘抵臺灣；[45]故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陶瓷或許就是以臺灣為據點往返東南亞的貿易船所攜回。

如前所述，澎湖風櫃尾採集或臺南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極有可能是由荷蘭人所攜來，不過流傳於臺灣古厝的十七世紀同式罐，則除了荷蘭人之外，也有可能是由鄭氏集團或日本朱印船海商之手帶入的。有關十七世紀之經由臺灣與泰國進行貿易往來的文獻記載極為豐富，如

㊸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3卷（東京：平凡社，1975），所收中村孝志氏之「序說」，頁10。

㊹ 據岩生成一氏的統計，自慶長九年（1604）至寬永十二年（1635）三十二年間，日本幕府派遣往南洋貿易的朱印船計335艘，其中駛往臺灣的船隻達36艘，參見同氏，《朱印船と日本町》（東京：至文堂，1962），頁35-38。另可參見長尾政憲，〈年次別・地方別・階層別渡航朱印船船數表〉，箭內健次等編，《海外交涉史の視點》2卷（東京：日本書籍株式會社，1976），頁300-301。

㊺ 參照岩生成一，〈明末日本僑寓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東洋學報》23卷3期（1936），頁78-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29至1634年任荷蘭東印度公司暹羅商館長的范符立特（Van Vliet）著《暹羅國志》就提到「粗細瓷器及其他中國貨乃由公司之船隻從臺灣（Tajouan）或兩三艘戎克船從漳州（Chin Scheeuw）每年運抵此地」；英國東印度公司駐暹羅職員懷特（George White）於1678年向倫敦總公司所提報告也指出：「每年有大批硝石由廈門王（King of Amoy，即鄭經）及交趾支那王（即廣南阮王）之代理商運返其國」。㊻《熱蘭遮城日誌》也記載了1632年裝載有鹿皮和兩仟餘件粗瓷器等貨物由暹羅赴日本貿易的戎克船，因季風關係而停泊臺灣；㊼《巴達維亞城日誌》也有許多暹羅船來到臺灣的記事，其中包括暹羅王子曾派遣大使赴日本，返國時於臺灣採買不少陶瓷器和絲織品等物資，無奈卻於1637年1月11日在臺灣麻豆河附近遇颶風而遭難，除大使和十四名暹羅人以及十一名中國人溺死，所購入的物資亦全數泡湯。㊽這樣看來，臺灣古厝的泰國Singburi窯系無頸四繫罐，既有可能由荷蘭人、鄭氏集團、朱印船海商所帶來，亦不排除是得自暹羅王的貿易船。從西川如見著於1709年之《增補華夷通商考》所記「自該國每年有一二艘國王之大船來日本，其船員均為居住該地之唐人，此外暹羅人亦有乘船來日者」等文獻記載可知，所謂暹羅船，其實有不少是由泰國華僑所經營。㊾無論如何，由於臺灣在日本和東南亞貿易之間往往扮演著重要的中繼角色，因此不排除表二所示日本出土有同類罐的近四十處遺址當中，有部分標本是經由臺灣而後輾轉傳入日本的。

事實上，高雄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遺址即曾出土十七世紀後半日本肥前地區的青花瓷，㊿2002年發掘臺南熱蘭遮城遺址時也曾出土肥前二彩唐津，

㊻ 以上兩條資料均轉引自陳荊和，〈十七世紀之暹羅對外貿易與華僑〉，收入凌純聲等編，《中泰文化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頁153及頁175。

㊼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93。

㊽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バタヴィア城日誌》1卷（東京：平凡社，1970），頁299-300。

㊾ 張美惠，〈明代中國人在暹羅之貿易〉，《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1951），頁161-176。

㊿ 臧振華等，〈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第3分（1993），圖版11；謝明良，〈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臺灣史研究》3卷1期（1996），頁229-244。

臺灣藝術 期刊資料庫

㊶後者於泰國拉布里（Lop Buri）宮廷接待所或馬來半島那空是貪瑪叻（Nakhon Si Thammarat）等遺址亦曾出土。㊷泰國濤坤寺（Wat Thao Khot）出土燒製於1650—1670年之間的肥前青花帶頸小罐，㊸也和流傳於臺灣民間後歸臺南市延平郡王祠民族文物館藏的作品完全一致。㊹

此外，見於瀨川攝影照的排灣族頭目家藏十六至十七世紀Singburi窯系短頸四繫罐亦有多種可能的取得途徑。由於荷蘭在臺期間曾設置「賫社」，委由漢人「社商」與原住民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而該一賫社制又為後來的鄭氏和清代所承襲，㊺因此目前已無從判斷排灣族人獲得此類陶瓷的具體時間和途徑。另一方面，分布於臺東和高屏地區的臺灣東部排灣族居地，正是北赤道洋流之北上支流，即所謂「黑潮」的行經路線，〈表四〉所見出土有此類短頸罐的沖繩本島或九州鹿兒島，正是近代學者模擬黑潮的航行據點。㊻其次，琉球自尚巴志元年（1422）統一全國以來，即熱衷於與東南亞的海上貿易活動。收錄於《歷代寶案》的琉球中山王於洪熙元年（1425）給予暹羅王的咨文中，也提到琉球國早在明洪武、永樂年間已遣使赴暹羅；十五世紀後期漂流至琉球宮古島並曾短暫居留沖繩本島的朝鮮人肖德誠在歸國後談及首府港「市在江邊，南蠻、日本國、中原商船來互市」。㊼所謂的「南蠻」，是以中國為尊之泛指包括臺灣在內的暹羅、呂宋、爪哇等南洋諸國的呼稱。對於順著季風往返於暹羅和琉球的貿易船隻而言，臺灣東部外海是其行經之路，所以我也不排除排灣族人有機會直接自主要是由華僑所經營的暹羅商船獲得陶瓷等物資。

㊶ 謝明良，〈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日本和歐洲陶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8（2005），頁228圖14。

㊷ Pariwat Thammapreechakorn, *Ceramic Art in Thailand*（Bangkok:Osotspa Co.1996）, p. 119.

㊸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1990)，頁175圖426。

㊹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民族文物館藏品選集》（臺南：臺南市政府，1995），頁6圖12。

㊺ 松澤員子，〈日本領臺以前の臺灣における漢人と原住民族の交易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別冊》14號（1991），頁280-281。

㊻ 黒潮文化の會，《黒潮の民族・文化・言語》（東京：角川書店，1980），頁8「野性II號」航路圖。

㊼ 和田久德，〈十四五世紀における東南アジア船の東アジア來航と琉球國〉，收入島尻勝太郎等三先生古稀紀念論集刊行委員會編，《球陽論叢》（ひるぎ社，1986），頁45-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在考慮排灣族人獲取泰國古陶瓷的多種可能的途徑時，排灣群傳世的彩色玻璃珠無疑亦可提供若干重要的啟示。相對於陳奇祿依據玻璃珠的化學成分不含鋇而主張其應屬東南亞系，[58]鮑克蘭（de Beauclair）則結合阿姆斯特丹市十七世紀玻璃工廠資料，認為其中包含了荷蘭玻璃珠。[59]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流傳於排灣群的玻璃珠之來源頗為複雜，僅就陳奇祿論文附圖所見現藏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之臺北帝大時期得自排灣群的玻璃珠而言，我認為其中至少包括了荷蘭珠、威尼斯珠(Venezia)、印度珠和日本江戶時期生產的江戶玻璃珠。[60]由於荷蘭、威尼斯和印度玻璃珠於十七至十八世紀經由荷蘭、西班牙人等之手大量外銷非洲和東亞，因此排灣內文社傳世的泰國Singburi窯系四繫罐很有可能如玻璃珠般，是透過與歐洲人的交易而獲得的。

以上，本文籠統地介紹了臺灣出土或傳世的泰國和越南十六至十七世紀陶瓷，然而僅止於陸地調查資料而未涉及臺灣海域的發現。雖然臺灣目前仍未見具嚴格學術意義的水下考古案例，不過由漁民打撈上岸的古代文物的數量卻不少，可惜作品多已流入古董市場，其中即包括泰國古陶瓷在內。設若以個別藏家的收集品做為討論的對象，很可能會因作品的確實來源已難求證而為人所詬病，所以以下我只挑揀曾任職臺灣文獻委員會具學者身份的簡榮聰著《臺灣海撈文物》一書所揭載的相關作品試著做一介紹。

成書於1990年代的《臺灣海撈文物》收錄了一件簡氏判定為元代陶瓷的彩繪小罐（圖25）。[61]不過，由於小罐的造型和繪彩技法極具特色，因此光是從圖版就可確認其應是來自泰國中北部蘇可泰（Sukhothai）北邊Yom河一帶，Sisatchanalai窯系所生產的釉下鐵繪器。[62]有關Sisatchanalai窯系鐵繪作品的年代

---

[58] 陳奇祿，〈臺灣排灣群的古瑠璃珠及其傳入年代的推測〉，《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28期（1996），頁1-5。

[59] Beauclair,"Dutch beads on Formosa," *Ethnographic Studies*, *The Collected Paper of Inez de Beauclair*（Taipei: Southern Material Center, 1986）, pp. 421-430.

[60] 如陳奇祿（同註58），圖版I之紅褐色管珠可能來自印度Purdal Pur玻璃作坊所生產；圖版II左列最下方即荷蘭鋸齒紋珠（Chevron）；圖版IV左列最下方白地紅綠彩玻璃珠即江戶蜻蛉玉；圖版IV最右列由下而上第3、4圖即威尼斯珠。

[61] 簡榮聰，《臺灣海撈文物》（臺北：教育部等，1994），頁140。

[62] John Shaw, *Introducing Thai Ceramics Also Burmese and Khmer*（Thailand:Craftman Press, 1987）, pp.24-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問題以往雖有諸多的推測，但直到近年才由數艘有相對年代可考的沉船所出同類作品而得以釐清（圖26）。由於1996年打撈自菲律賓呂宋島西岸的十六世紀中期*San Isidro*沉船伴出有同類Sisatchanalai窯系鐵繪作品，[63]故可輕易得知前述臺灣海域打撈上岸的鐵繪小罐的年代也約在這一時期。其次，《臺灣海撈文物》還另收錄了兩件漏斗狀素燒封底小杯（圖27），[64]這類小杯一般高在10公分以下，除了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品之外（圖28），還可見於日本沖繩、大分、大阪和長崎等地遺跡，[65]特別是近年公佈的長崎金屋町[66]和爐粕町[67]遺跡有清楚的圖片和線繪（圖29），有利於參考比較之用。川口洋平依據日本遺址所出標本的胎質特徵和器表旋坯痕跡等推測其或是泰國所燒製的素燒器，進而參酌爐粕町遺跡標本的出土情況，推測其於日本有可能是做為坩鍋來使用，年代則是元龜元年（1570）長崎開港至十七世紀前半之間。[68]近來，森本朝子則又推測該素燒小杯可能來自十六世紀葡屬印度的首都果阿。[69]其實，如果說做為通往歐洲海上交通要道，同時也是葡萄牙人北上日本要寨的果阿陶製品出現於臺灣海域也非不可思議之事。眾所周知，臺灣以Formosa一名出現於1554年葡萄牙人羅伯．歐蒙（Lopo Homen）的地圖上，據說即是因葡人自澳門啟航或自果阿北上日本途經臺灣，望見寶島時所發出的「Ilhas Formosa」（福爾摩沙，即可愛的地方（lovely，handsome））之讚嘆，而被同船的荷蘭籍航海官林士登（Linschoteen）記錄了下來。當然，以上有關素燒小杯的產地諸說均止於臆測的階段，目前尚難確證。但可明言的是，熱蘭遮城遺址所出素燒小杯殘片係以高溫燒成，其胎質緻密，呈青灰色調，其與中國南方高溫素燒炻器亦有類似之處。因此，我比較傾向這類小陶杯可能是中國南方某地所燒製。

無論如何，臺灣本島和外島澎湖既出土有泰國Singburi窯系製品，臺灣海域

---

[63] 小川光彥等，〈フィリピン・サンイシドロ沉船の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21（2001），頁90-105。

[64] 簡榮聰，同註61，頁159圖左，右。

[65] 川口洋平，〈産地不明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23（2003），頁66-67。

[66]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同註33，頁53圖37之1-3。

[67]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同註34，頁21及頁85表9之596。

[68] 川口洋平，同註65，頁66。

[69] 此承蒙森本朝子的教示（2005.4.11於臺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打撈出年代不晚於十六世紀的泰國Sisatchanalai窯系鐵繪罐，結合臺南市立安平文化中心典藏一件品名卡片上明確標示是海撈獲得的所謂明代碗，⑦⓪有較大可能是十四至十五世紀的越南陶瓷，以及我於古董舖親眼目睹的幾件傳說得自臺灣海峽的泰國十五世紀鐵繪魚紋盤，或可勾勒出東南亞國家陶瓷北上輸出情況之一端，而臺灣海域打撈上岸的作品即是商船遇難失事的遺留。我雖無法確定十七世紀之前經由臺灣海域往來於日本、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船隻是否曾停靠臺灣本島與原住民進行交易？但是，我們應該留意到，1980年代陳信雄著《澎湖宋元陶瓷》所刊載的一件採集自澎湖的同氏所謂宋元時期泉州青瓷（圖30），⑦①其實是越南製品。類似的青瓷印花標本曾見於日本博多十四—十六世紀遺跡（圖31）以及對馬的水崎遺跡，⑦②森本朝子認為其應是越南北中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之間的製品，⑦③並曾針對越南Ha Lan遺址出土同類標本進行了成分分析。⑦④另外，現藏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的著名漢學家馬伯樂（Maspero）採集標本（圖32），⑦⑤也和上述澎湖越南青瓷完全一致（圖33）。⑦⑥從標本的外觀看來，兩者之圈足均為器身成形後再予接合，是越南十五世紀

⑦⓪ 筆者實見，另據展品卡片說明，捐贈人是南市大勇街鄭氏居民。

⑦① 陳信雄，《澎湖宋元陶瓷》（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85），頁28圖34。

⑦② 博多64次32號溝（14c前半—16c前半）及87次。此轉引自森本朝子，同註6，頁10。水崎遺跡見田中淳也等，《美津島町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8集・水崎遺跡》（長崎縣美津島町教育委員會，1999），此轉引自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東アジア中世海道 海商・港・沈沒船》（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2005），頁67圖II-31。

⑦③ 澎湖所見上述越南印花青瓷的可能年代和產地承蒙森本朝子女士的教示（2001年12月10日於臺大藝術史所），謹誌謝意。另可參見同氏，〈北部ヴェトナム出土の所謂宋代陶磁について〉，《東洋陶磁》9（1979-83），頁5-86；以及〈日本出土のベトナム初期貿易陶磁〉，《海路》創刊號（2004），頁61。

⑦④ Morimoto Asako and Yamasaki Kazuo, *Technical Studies on Ancient Ceramics Found in North and Central Vietnam*（Fukuoka, 2001）, pl.-84, mov-5.

⑦⑤ 承蒙Musée Guimet東南亞研究部長Pierre Baptiste的好意，允許本文使用該館馬伯樂採集標本（Maspero Collection, MA 5474/343），謹誌謝意。另外，圖片是由森本朝子女士所拍攝。

⑦⑥ 前述見於《澎湖宋元陶瓷》一書的越南青瓷標本，現在陳列於馬公市澎湖開拓館。承蒙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何寄澎教授的引薦，在縣文化局曾慧香局長和洪玉菇女士的大力相助之下，我才有機會上手標本進行目驗，並承文化局惠賜標本圖檔，謹在此致以謝意。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以前流行的成形技法之一。臺灣海峽和外島澎湖出土有東南亞陶瓷，既提示我們日本博多遺跡的同類東南亞陶瓷有的可能就是經由澎湖而後運達的。更重要的是，前述澎湖越南印花青瓷殘片若非海船失事遺留而後沖刷上岸，則又說明了澎湖至遲在十四至十五世紀已經具有貿易轉運站的功能，此對於正確評估澎湖中屯等處貝塚所見大量陶瓷標本的性質以及澎湖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有很大的助益。

小結

早在1970年代，三上次男已經提到開鑿臺南安平之間運河時曾經出土大量的泰國陶瓷。⑰可惜同氏論文並未出示任何圖版，也未透露消息來源或明白交代是否親眼實見？就此而言，本文以幾張照片和出版品之圖版為線索，結合近年考古發掘遺物，初步證實了臺灣本島、外島澎湖以及臺灣海域確實遺留有泰國、越南等地東南亞古陶瓷。其中，Singburi窯系無頸和短頸四繫罐可以從造型和尺寸大小判斷其有可能是裝盛某種物品的外容器。過去日方學者也嘗試結合《歷代寶案》所載暹羅國王多次餽贈琉球國王香花酒一事，推測沖繩出土的這類泰國四繫罐可能即是香花酒罈，⑱然而也僅止於推測，並無確證。無論如何，如果說該類泰國四繫罐只是做為某種商品的外容器被攜入臺灣，故罐體本身不屬於嚴格定義下的所謂外銷瓷範疇，那麼臺灣海域所見小罐和碗等標本，則是名符其實的東南亞外銷陶瓷。

對於習慣用中國外銷瓷無遠弗屆的單向思考角度，同時總是以已經高度成長的中國窯業來評估東南亞陶瓷水準的人而言，往往容易誤以為中國瓷窯囊括了東亞所有的陶瓷外貿活動。姑且先不論臺灣熱蘭遮城遺址發掘出土有十七世紀日本和泰國陶瓷，以及德國萊茵地區的鹽釉炻器或荷蘭所燒製的馬約利卡

⑰ 三上次男，〈ベトナム陶磁と陶磁貿易〉，《世界陶磁全集》16（東京：小學館，1984），另外，小西雅德也繼承了三上氏的說法，但同樣未明示出處。見同氏，〈タイ陶磁器の輸出地域について〉，《國學院大學考古資料館紀要》（樋口清之博士喜壽紀念，1987），頁228。

⑱ 金武正紀，〈沖繩出土のタト・ベトナム陶磁〉，《貿易陶磁研究》11（1990），頁99。另外，森村健一，同註21，還補充指出，《歷代寶案》還有米酒、椰子酒的記載，《瀛涯勝覽・暹羅國》條也記載該國特產中有蒸餾酒。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Majolica）錫釉陶器等分別來自日本、東南亞和歐洲等地的陶瓷器。[79]我們應該留意香港九龍西貢沙咀（Sha Tsui，Sai Kung）所發現的一艘沉船亦見泰國陶瓷，從報告書所揭示的圖版看來，我推測沉船所出黑褐釉長頸罐口沿殘片可能來自Sisatchnalai窯系製品（圖34）。[80]由於罐的口頸部位特徵和馬來半島*Turiang*、[81]印尼加里曼丹*Bakau*[82]等兩艘十五世紀前半沉船打撈上岸的同類四繫罐的外觀特徵一致，故可推測西貢沙咀沉船的泰國陶瓷的年代也在十五世紀前半，並且同屬四繫罐的殘片。

事實上，東南亞陶瓷不僅曾出現在中國廣東省外島香港，也出沒於中國沿海省分，甚至於還因其有利於夏日貯水而博得時人好評，以致於還被課以關稅。如張燮《東西洋考》就記載萬曆十七年（1589）「番泥瓶」每百個稅銀四分，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因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故「每百個稅銀三分四釐」。[83]明末崇禎年間修撰的福建《海澄縣志》也提到有一種「夷瓶」，是「以夷泥為之，陶而成器俗名干柸，夏日貯水可以不敗。出下港者其色紅」。[84]我認為所謂「番泥瓶」應即「夷瓶」。問題是傳言出自下港（今印尼萬丹）的紅胎番泥瓶或夷瓶指的到底又是什麼呢？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其極可能就是此次熱蘭遮城遺址亦曾出土並流行於東南亞地區，主要來自泰國中部Ayutthaya（大城）地

---

[79] 謝明良，同註51，頁209-232。

[80] R.Frost, C. H. Ho, Bobby Ng.“ Sha Tsui,”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V (1974), p.32, fig. 9.該報告書已經辨識出作品屬泰國Sawankhalok窯作品，但認為年代在十四世紀。

[81] Roxanna M. Brown, *Turiang: A Fourteenth Century Shipwreck in Southeast Asia Waters*（Pacific Asia Museum, 2000）, p. 29, pl. 18. 由於*Turiang*沉船文物與十五世紀前半印尼*Bakau wreck*的作品極為類似，因此Roxanna M. Brown亦已放棄十四世紀的說法，修訂認為Turiang應是1400-1424/30沉船。參見同氏，*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 in Southeast Asia*（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Ph.D Dissertation, 2004）, p.139.

[82] Michael Flecker,“The Bakau wreck: an early example of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0-2（2001）, pp. 221-230.文未附圖，作品現藏紐西蘭，筆者實見。

[83] 張燮，《東西洋考》國學基本叢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卷7，頁96、98。

[84] 梁兆陽修，《海澄縣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卷11頁15（頁4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區所燒造的低溫素燒陶罐。由於器體無釉可以透氣，同時因外表水分蒸發時所產生的氣化熱可以冷卻罐內的水，因此確實有利夏日貯水。應予一提的是，該類泰國素燒陶罐也隨著船舶出沒各地，如本文前亦提及的*Bakau*（圖35）、*Koh Khram*、*Pattaya*、*Ko Si Chang*、*Witte Leeuw*等多艘十五至十七世紀沉船都可見到這類標本。臺灣之外，前引西貢沙咀十五世紀沉船[85]以及大嶼山竹篙灣一處推測是往來廣東至東南亞的中途據點，也出土了同類素燒罐殘片。報告者認為為竹篙灣遺跡陶瓷可能和來華的葡萄牙人的活動有關（圖36）。[86]不過，由於葡萄牙人首次訪問中國的年代是在1514年，並於1518年初次造訪暹羅，[87]因此相對年代約於十五世紀前半的竹篙灣出土泰國陶瓷不太可能和葡萄牙人有關，[88]而有較大可能是暹羅或中國商船的遺留。另一方面，圍繞於東南亞陶瓷的浪漫典故似乎不少，除了前述夏日貯水可以不敗的中國記事，日本亦將泰國素燒陶罐轉用於茶席中裝盛洗濯茶碗、補充茶釜用水的水指或裝盛洗濯茶碗廢水的建水；荷蘭畫家Cornelis Bega（1631/32—1664）繪於1663年的畫作當中也將臺南熱蘭遮城亦曾出土的泰國四繫罐做為畫面的題材（圖37），[89]其和瀨川孝吉所拍攝的排灣族頭目盛裝照和寶物照（同圖10、11）所欲傳達的訊息形成有趣的對比。

（本文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補助〈從亞洲區域的角度看臺灣出土貿易陶瓷〉專題研究計劃（NSC 95-2411-H-002-091-MY3）之部分成果，特此申謝。部份內容曾以英文發表於*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 vol.38 (2006),pp.41-75.此次中文稿，另增加了第三和第四章。此外，熱蘭遮城遺址標本相片是由該遺址發掘主持人中央研究院劉益昌教授所提供，標本拍攝則承蒙王淑津同學的協助，謹誌謝意。）

（責任編輯：廖佐惠）

---

[85] R. Frost ,C.H. Ho ,Bobby Ng,同註80，p. 31, fig. 8。

[86]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招紹璿等），同註80，頁516-517。另外，標本圖片可參見周若水，〈陶瓷之路—竹篙灣出土文物〉,《中國文物世界》67（1991），頁115圖右上。但周氏認為竹篙灣遺址也有可能和十六世紀最早來華葡萄牙人的活動有關。

[87] 張天澤著（姚楠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頁38、131等參見。

[88] 與竹篙灣泰國印紋陶片和貼花紋壺最為接近的作品見於相對年代約在十五世紀前半的*Bakau wreck*等沈船，參見Michael Flecker，同註82。

[89] Peter C. Sutton et. al., *Master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Dutch Genre Painting*（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84）, pl.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編號	發現地點	沈船名稱	年代	出處
1	菲律賓八打雁（Batangas）	San Diego	1600	Jean-Paul Desroches, *The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6).
2	泰國（Khram）	Ko Khram	15c中期	Roxanna M. Brown,"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Ko Khram Sunken Ship,"*Oriental Art*, 21-4, (1975).
3	泰國（Kradat）	Ko Kradat	16c中期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S. Prishanchittara,"The Excavation of the Ko Kradat Wrecksite Thailand 1979—1980","The Excavation of the Ko Kradat Wrecksite, Thailand,"*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1-2 (1982).
4	泰國（Ko Si Chang）	Ko Si Chang I	1573—1619	1. 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The Ko Si Chang One Shipwreck Excavation 1983—1985, A Progress Report,"*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5-2(1986),p. 105. 2.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and Vidya Intakosi, *The Ko Si Chang Shipwreck Excavation*, Australia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no.4(1987).
5	馬來西亞	Singtai	16c中期	Roxanna M. 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6	馬來西亞	Xuande	16c中期	Sten Sjostrand, *The 'Xuande' Wreck Ceramics* (Summer, 1977).
7	馬來西亞	Risdam	1727	Jeremy Green,"The Survey of the VOC fluit Risdam(1727), Malaysi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5-2(1986).
8	澳洲西岸	Vergulde Draeck	1656	Jeremy Green,"The Wreck of the Dutch East Indiaman the Vergulde Draeck(1656)",*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2-3(1973).
9	非洲幾內亞	Mauritius	1609	M.L'Hour and L.Long,"The Wreck of an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Indische Companie':The Mauritius(1609)",*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19-1.
10	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Helena）	Witte Leeuw	1613	G. C. Vander Piji-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Witte Leeuw"*(Amsterdam RIJKS Museum, 1982).
11	日本九州長崎縣小值賀町山見沖海底		16c末期—17c初期	九州、沖繩水中考古協會、小值賀町教育委員會，《山見沖海底遺跡—小值賀町山見海底遺跡確認調查報告—》，小值賀町文化財調查報告集16（20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編號	出土地點	年代	備註	出處
1	日本博多（第60次調查）24號土坑	16c末—17c初		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について〉，《陶磁器が語る交流》（2004）。
2	日本博多（第60次調查）35號土坑	16c末—17c初		同（1）
3	日本博多（第60次調查）II區II面			同（1）
4	日本博多（第62次調查）5542號遺構	16c末期水井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博多48—博多遺址群第62次調查概要—》，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397集（1995）。
5	日本博多（第124次調查）	16c後半—		1.《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範圍確認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86）。 2.《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西側建造物復元事業伴う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0）。 3.《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道路及びカピタン別莊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 4.《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南川・西側護岸石垣確認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
6	日本長崎縣牽町（袋町）III層	19c		1.《榮町遺跡—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 2.《榮町遺跡（舊袋町・市立長崎高等學校基地》（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	日本長崎縣金屋町（今町）41、45號土坑	16c末—19c初		《金屋町—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2）。
8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同（5）
9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同（5）
10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長官別墅區	同（5）
11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長官別墅區	同（5）
12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道路區	同（5）
13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道路區	同（5）
14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長官別墅區	同（5）
15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T5			同（5）
16	日本長崎縣出島荷蘭商館南護岸石牆瓦層	～幕末、明治？		同（5）
17	日本長崎縣平戶荷蘭商館			〈平戶和蘭館跡の發掘し〉，《平戶市の文化財》38（1994）。
18	日本長崎縣葉町（本紺屋町）			同（6）
19	日本長崎縣葉町（本紺屋町）			同（6）
20	日本長崎縣葉町（本紺屋町）			同（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1	日本長崎縣萬才町（大村町）SK401	1610—1640		1.《長崎家庭裁判所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2）。 2.《朝日新聞社長崎支局敷地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2）。 3.《萬才町遺跡—長崎縣庁新別館建て替えに伴う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1995）。 4.《萬才町遺跡—朝日生命ビル建設に伴う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6）。
22	日本長崎縣萬才町E2區、7層	16c末—17c初		同（21）
23	日本長崎縣萬才町（大村町、島原町）			同（21）
24	日本長崎縣五島町（浦五島町）石牆2前方	16c末—1663		《五島町遺跡》（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1）。
25	日本長崎縣金屋町（金町A3、46層）	17c初—？		《金屋町遺跡—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2）。
26	日本長崎縣興善町（新町）北I區			1.《興善町遺跡—天滿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7）。 2.《興善町遺跡—日本團體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8）。 3.《興善町遺址—東邦生命保險第2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27	日本長崎縣萬才町（本博多町）26號遺構	17c—18c		同（21）
28	日本長崎縣櫻町（豐後町）地下室	—1663？		1.《櫻町遺跡—長崎縣警察官舍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1998）。 2.《櫻町遺跡—オフィス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8）。 3.《櫻町遺跡》（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9）。 4.《櫻町遺跡—サンガーデン櫻町マンション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0）。
29	日本長崎麿屋町遺跡（SD1）	16c—17c		《麿屋町遺跡—長崎市立諏訪小學校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2）。
30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3，第1層	1615年燒失面	堺市櫛屋町車3丁	《堺市文化財調查報告》15（1983）。
31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47，SB004	1615年燒失土藏內	堺市甲匪町西2丁	1.《堺市文化財調查報告》35（1987）。 2.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SK47地點）SB04出土陶磁器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7（1987）。
32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SK016第2次面	1596年地震面	堺市車之町西1丁	《堺市文化財調查報告書》44。
33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SK028第3次面	1575年燒失面	堺市車之町西1丁，壺內裝盛硫磺	同（32）
34	日本大阪堺市環濠都市邊跡（SKT），SK017第1次面	17c後半—18c初	堺市車之町西1丁	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製四耳壺〉，《貿易陶磁研究》9（1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5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241	1615年燒失面	堺市熊野町西2丁	《堺環濠都市遺跡發掘調查現地說明會資料—熊野町西2丁SKT241—》（1989）。
36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230	15c—16c	堺市車之町西1丁	《堺埋藏文化財だより》創刊號
37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214	17c初	堺市宿院町西1丁	同（34）
38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202，SB05			森村健一，〈日本における遺跡のタイ陶磁器〉，《東洋陶磁》23、24（1995）。
39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202，SK11			同（38）
40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411			同（38）
41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邊跡（SKT）361			同（38）
42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421-1			同（38）
43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179			同（38）
44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SKT）372			同（38）
45	東大阪市			同（38）
46	富田川河床遺跡FU、FTZ			同（38）
47	大阪城下町遺跡平野町1丁目			同（38）
48	日本愛媛縣松山市湯築城址第3階段第7區劃	16c中		愛媛縣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湯築城跡道後公園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一分冊（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9	日本大分市大友城下町（5*210）	1568年火災層		大分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財室，《大分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年報》9（1998）。
50	臺灣澎湖馬公風櫃尾城址	1624年前後	劉益昌考古工作室提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提供，筆者實見。
51	臺灣臺南安平熱蘭遮城遺址（TP3A-I2）		劉益昌考古工作室提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益昌提供，筆者實見。
52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	17c	埋於近暖爐地面下坑洞，作為收存爐灰爐的容器	《掘り出された都—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ク》（東京：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三

編號	發現地點	沈船名稱	年代	出處
1	菲律賓八打雁（Batangas）	San Diego	1600	1.Jesus T.Peralta,*Saga of the San Diego*(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3). 2.Jean-Paul Desroches,*The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6).
2	菲律賓	Pandanan	15c中期	1.森村健一，〈フィリピン・パンダナン島沖沈沒船引き揚げ陶磁器と中近世貿易システム〉，《貿易陶磁研究》21（2001）。 2.Allison I. Diem,"The Significance of Pandanan Shipwreck Ceramics as Evidence of Fifteenth Century Trading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Bulleti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2(1998-2001).
3	泰國（Si Chang III）	Ko Si Chang III	15c末期	Jeremy Green,Rosemary Harpers and Vidya Intakosi, *The Ko Si Chang Three Shipwreck Excavation*(1986).
4	泰國	Klang Aow	16c前半	向井亙，〈タイ黒褐釉四耳壺の分類と年代〉，《貿易陶磁研究》23（2003）。
5	泰國	Pattaya		Jeremy Green and Rosemary Harp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Pattaya Wreck Site and Survey of Three Other Sites Thailand*,Australia Institute for Maritime Archae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no. 1(19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越南惠安 （Hoi An）	Hoi An	15c後半— 16c前半	1.*Treasures From the Hoi An Hoard,Import Vietnamese Ceramics from a Late15th/ Early 16th Century Cargo*, Butterfields (San Francisco, 2000). 2.菊池誠一，〈ベトナム中部の沈没船引き揚げ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8（19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四

編號	出土地點	年代	備註	出處
1	日本沖繩縣首里城京之內（SK01）	1459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首里城跡—京の內跡發掘調查報告書（I）—》沖繩縣文化財調查報告書132集（1998）。
2	日本沖繩縣具志川村ヤッチのガマ		轉用為藏骨器	沖繩縣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ヤッチのガマ　カンジン原古墓群》沖繩縣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查報告第6集（2001）。
3	日本博多（第124次調查）			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について〉，《陶磁器が語る交流—九州、沖繩から出土東南アジア產陶磁器—》（東南アジア考古學會事務局，2004）。
4	日本博多（第124次調查）	15c末—16c（？）		同（3）
5	日本鹿兒島縣春日町遺跡B地點			鹿兒島市教育委員會，《春日町遺跡B地點》（2002）。
6	日本鹿兒島縣谷山弓場城跡			鹿兒島市教育委員會，《谷山弓場城跡—上卷—》（1998）。
7	日本堺環濠都市遺跡（SKT）230地點第5次燒土層第5次生活面SB14貼床	15c	與備前乘岡編年中世5期b（15c4/4）擂砵共伴出土	森村健一，〈15世紀代のタイ、ノイ川窯系四耳壺について〉，《南島考古》21（2002）。
8	日本高知縣高岡郡姬野野土居跡	15c	與備前乘岡編年中世5期a（15c3/4）擂砵共伴出土	葉山村教育委員會，《高知縣高岡郡葉山村姬野野土居跡・葉山村總合福祉センター建設に伴なう調查報告書—》葉山村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第4集（2000）。
9	中國香港大嶼山竹篙灣遺址			筆者實見。感謝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孫德榮先生同意筆者拍攝標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表四各項資料除了曾部份參考原發掘報告書以外，還參照了下列諸氏論文，謹誌謝意！

森村健一，〈16—17世紀初頭の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四耳壺—タイでの窯跡沈没船の出土例—〉，《貿易陶磁研究》9（1989）。

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タイ製四耳壺〉，《貿易陶磁研究》9（1989）。

森村健一，〈日本における遺跡出土のタイ陶磁器〉，《東洋陶磁》23、24（1995）。

向井亙，〈タイ黒褐釉四耳壺の分類と年代〉，《貿易陶磁研究》23（2003）。

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器について〉，《陶磁器が語る交流—九州、沖縄から出土東南アジア産陶磁器—》（東南アジア考古學會事務局，2004）。

扇浦正義、川口洋平，〈長崎出土の東南アジア陶磁〉，同前引書收。

Roxanna M.Brown & Sten Sjostr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 Department of Museums and Antiquities, Kuala Lumpur, Malaysia, 2001.

Roxanna 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4.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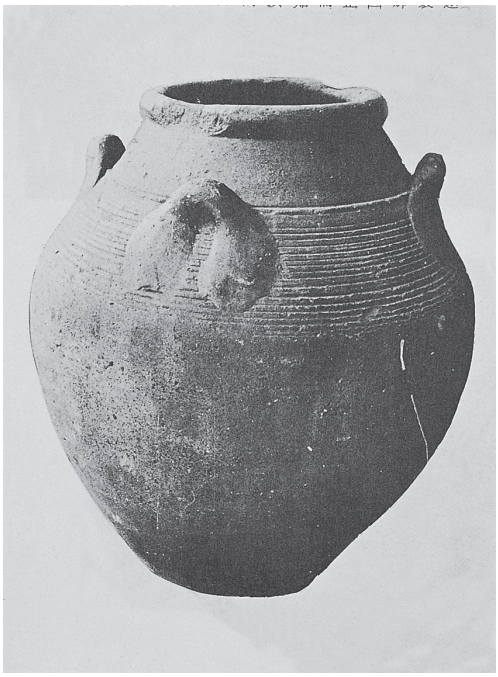


圖1　臺灣古厝傳世的泰國Singburi窯系四繫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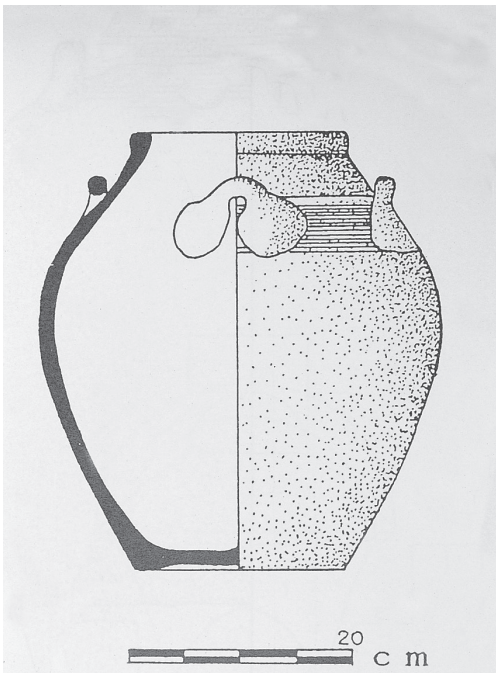


圖2　Mae Nam Noi 2號窯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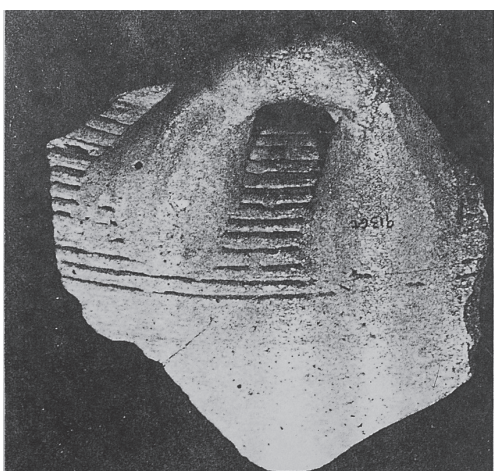


圖3　四繫罐　泰國Singburi窯系　*Vergulde Draeck*沈船打撈品 165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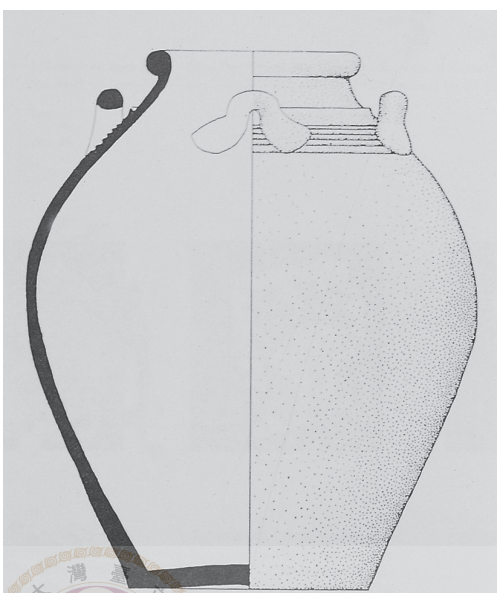


圖4　四繫罐　泰國Singburi窯系　*Ko Si Chang I*沈船打撈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四繫罐 泰國Singburi窯系 *Witte Leeuw*沈船打撈品 16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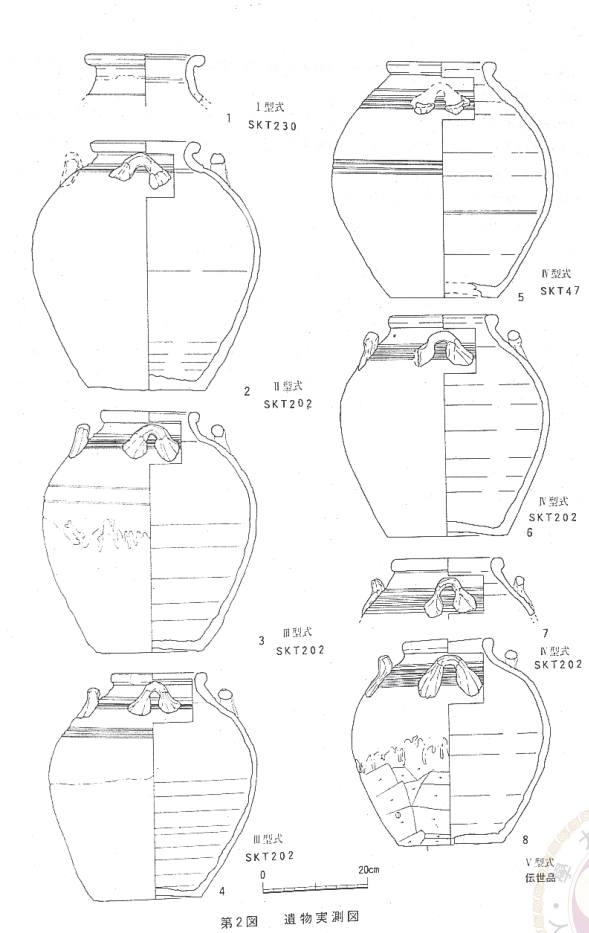


圖6 日本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 四繫罐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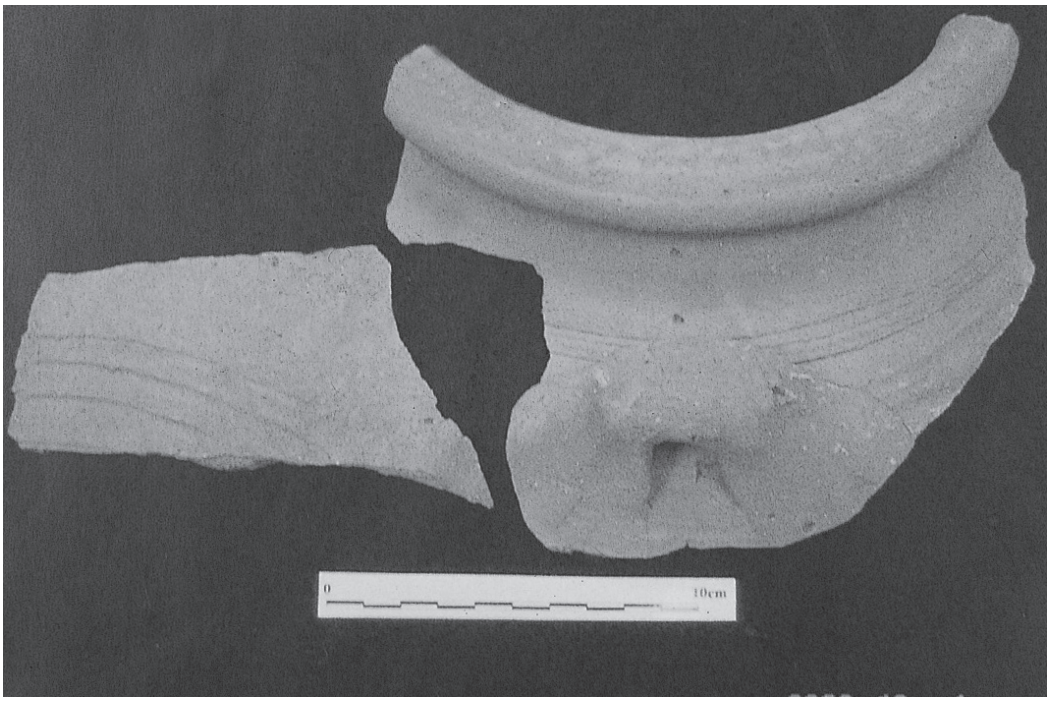


圖7　Singburi窯系帶繫罐標本 劉益昌採集自澎湖風櫃尾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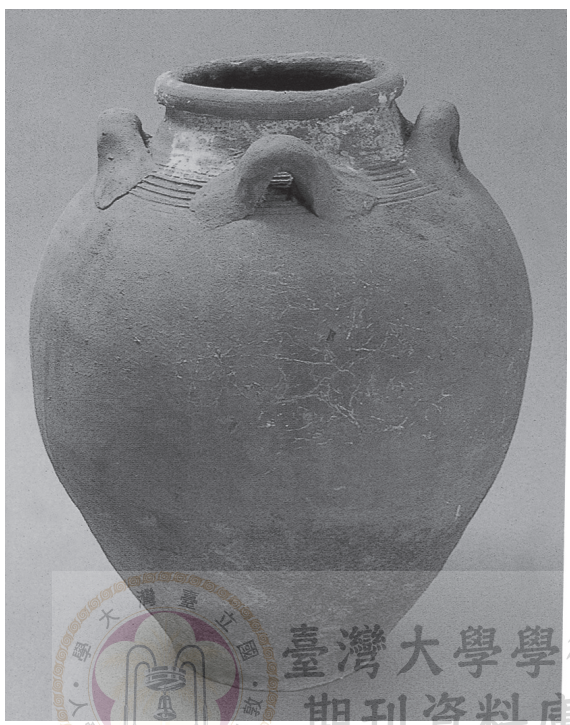


圖9　Singburi窯系四繫罐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8a Singburi 窯系帶繫罐標本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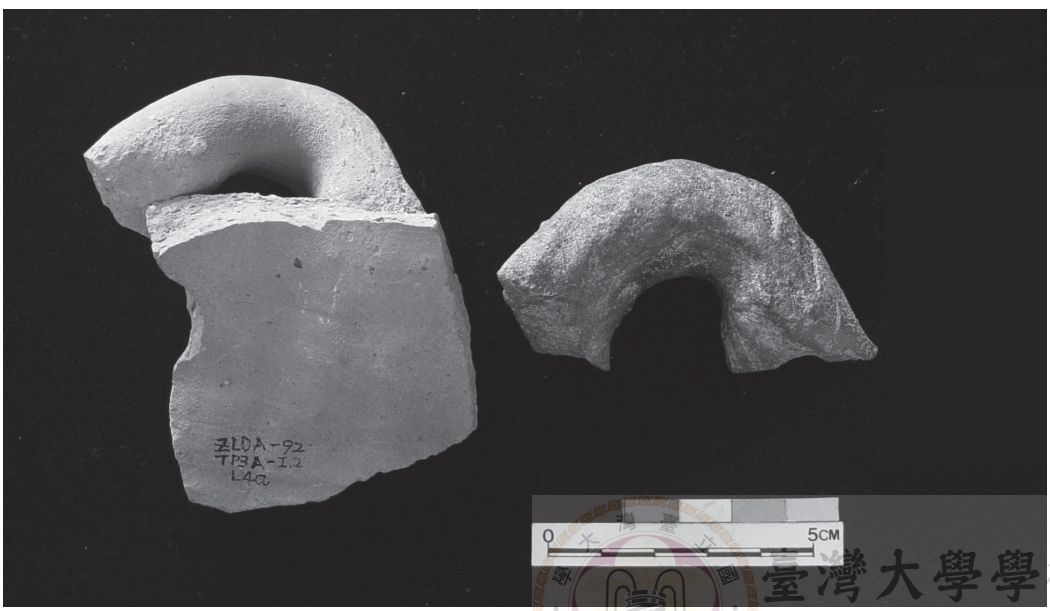


圖8b 同上 背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　排灣族頭目盛裝照 瀨川孝吉攝 1928-1939年



圖11　排灣族寶物 瀨川孝吉攝 1928-1939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San Diego*沈船打撈品 1600年



圖13 日本大分市出土



圖14 沖繩首里京之內遺跡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5　*San Diego*沈船打撈品 1600年



圖16　香港大嶼山竹篙灣出土泰國帶繫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7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泰國印紋陶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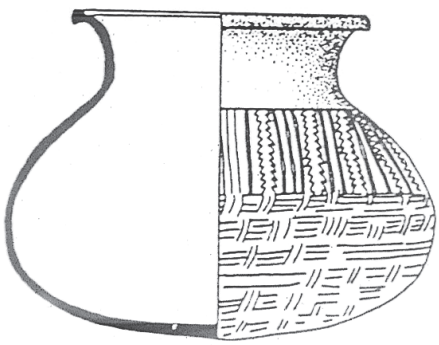


圖18 泰國*Ko Si Chang*沈船打撈品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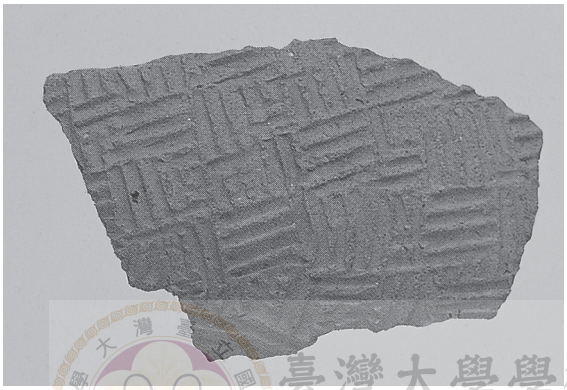


圖19 長崎市興善町遺跡出土 泰國陶紋陶殘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越南陶瓷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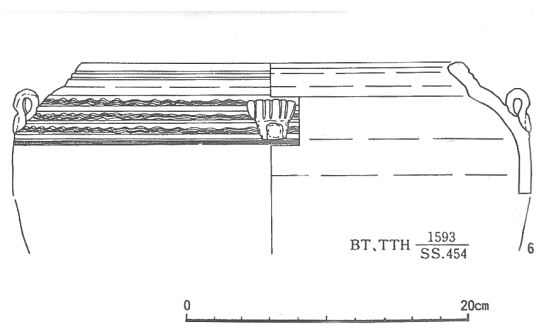


圖21　越南窯址出土帶繫罐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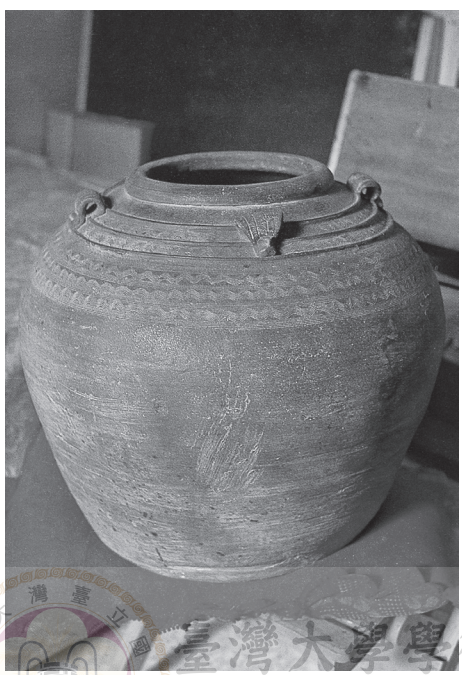


圖22　台灣古厝傳世的越南帶繫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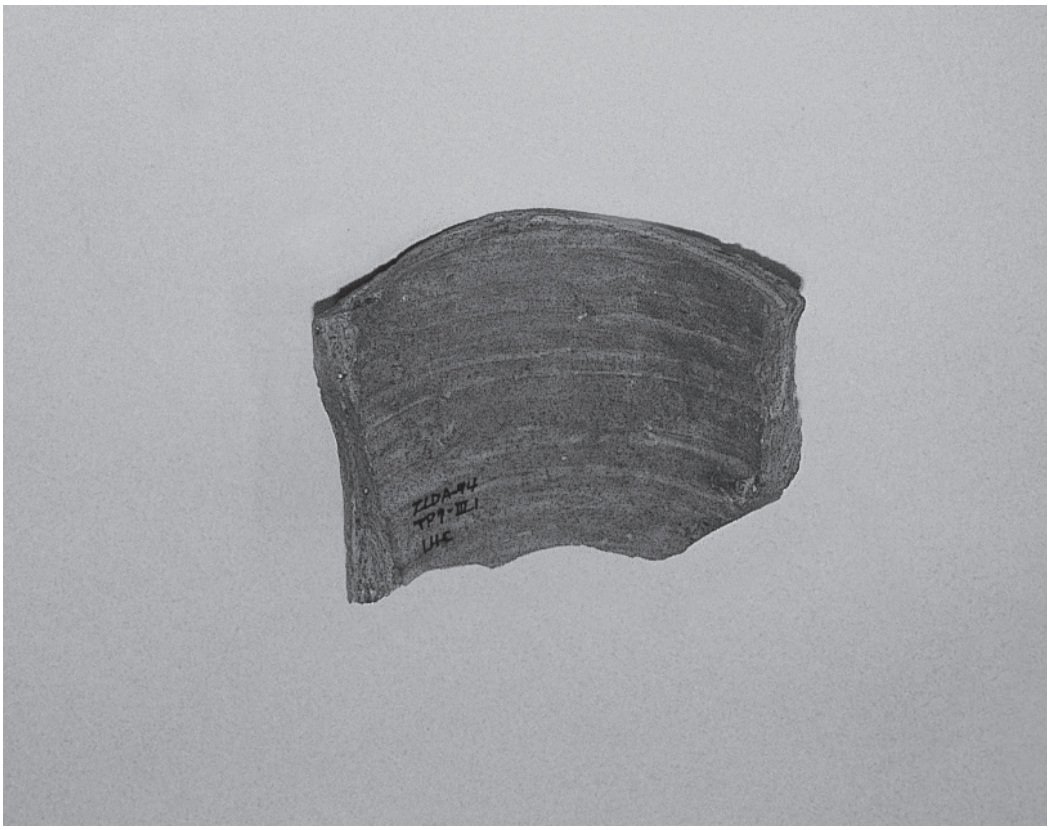


圖23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硬陶罐殘片



圖24 越南窯址出土的大口高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5　臺灣海域打撈上岸的泰國鐵繪小罐



圖26　菲律賓*San Isidro*沈船發現的泰國鐵繪小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7 臺灣海域打撈上岸的硬陶杯



圖28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硬陶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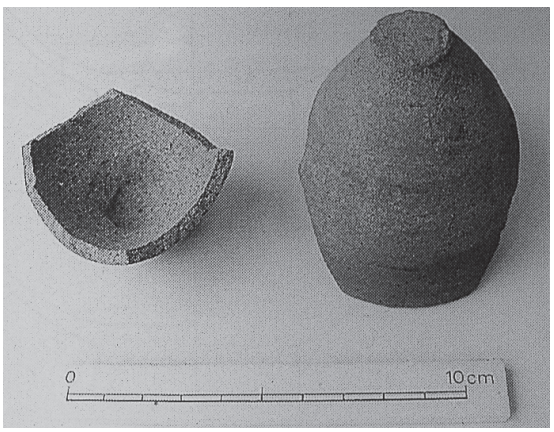


圖29 長崎出土硬陶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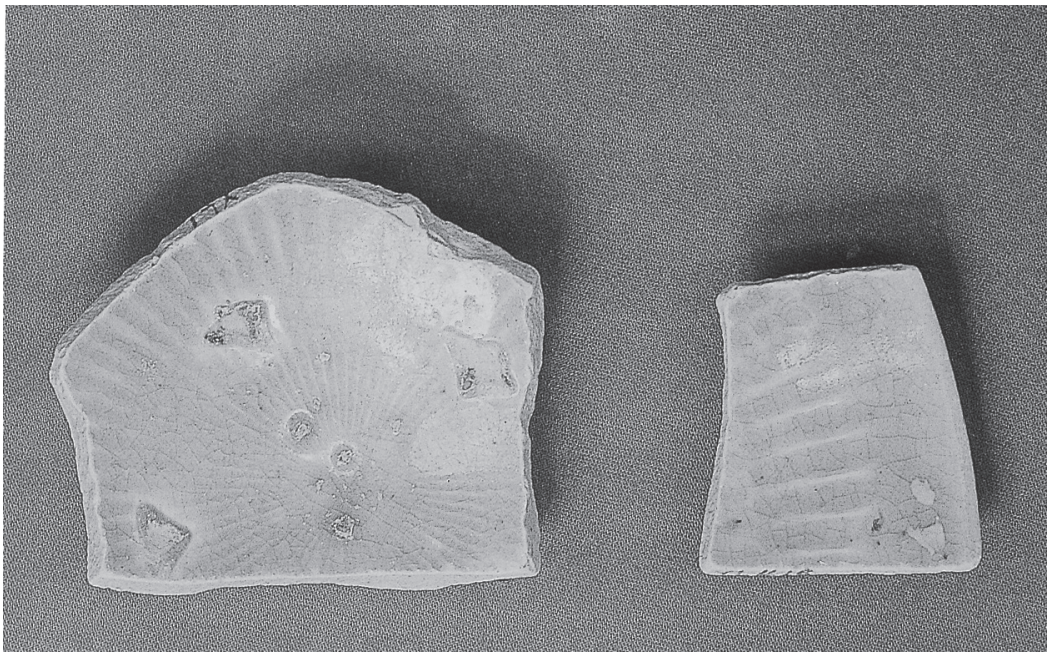


圖30　採集自澎湖的越南印花青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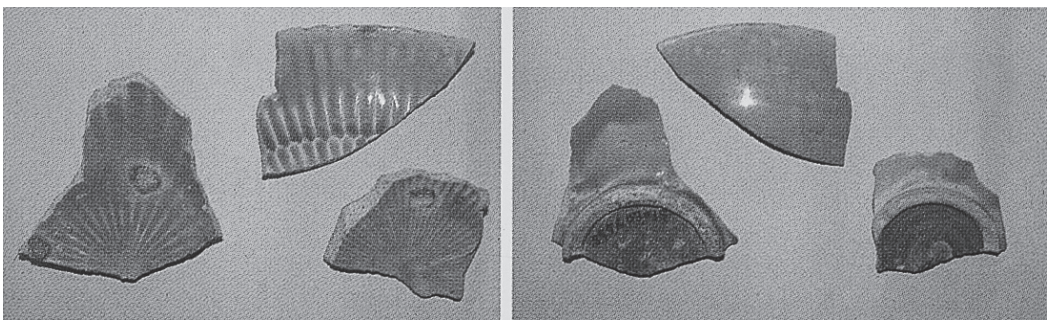


圖31　日本博多出土越南印花青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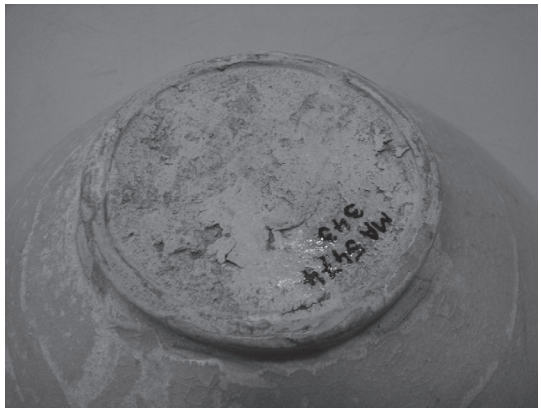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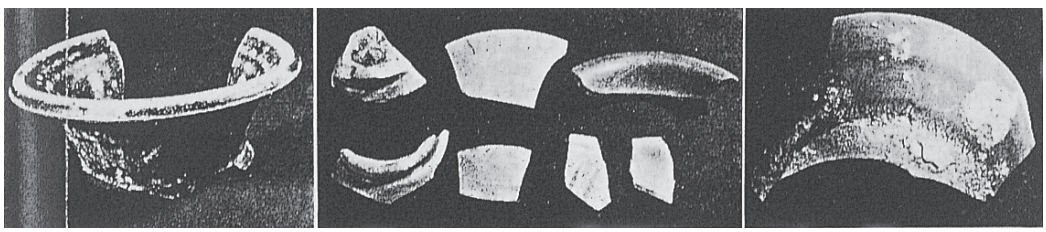



圖32ab　吉美博物館藏（Musée Guimet）馬伯樂（Maspero）採集的越南印花青瓷



圖33　採集自澎湖的越南青瓷（外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a

d　　e

圖34　香港九龍沈船遺跡所見泰國陶瓷標本



圖35　印尼*Bakau*沈船發現的泰國印紋陶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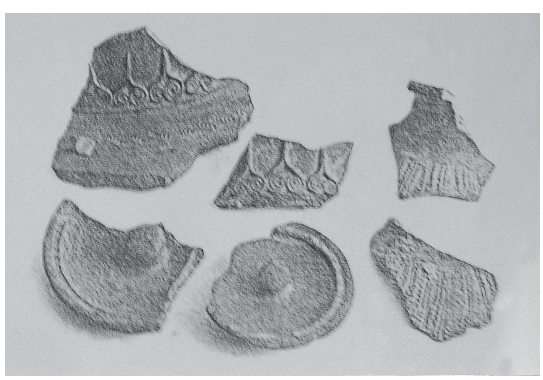


圖36　香港大嶼山竹篙灣遺跡出土泰國陶瓷標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Cornelis Bega 1663年繪作所見泰國四繫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